



传统与现代之间

晚清人物评介

贾蕊华 编著

近代中国除了屈辱之外

与自强、破除与建设、学习、探索、多
维探索。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晚清人
物，在民主与专制、中国与世界等主题
中困顿、彷徨，他们在追求中超越着自
己，也超越着时代。

梁启超

左宗棠

孙中山

张之洞

曾国藩

康有为

李鸿章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贾蕊华◎编著

近代中国除了屈辱之外，还有觉醒与自强、破除与建设、学习与反思等多维探索。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晚清人物，在民主与专制、中国与世界等主题中困顿、彷徨，他们在追求中超越着自己，也超越着时代。

传统与现代之间

晚清人物评介

梁启超

左宗棠

孙中山

张之洞

曾国藩

李鸿章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人物评介 / 贾蕊华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2
ISBN 978 - 7 - 5668 - 0464 - 8

I. ①传… II. ①贾…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0.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256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弓设计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

字 数：237 千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2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言

如果说通史是历史的骨架，那么人物就是这骨架上的血与肉。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血肉之躯，没有历史人物对时代的悲与乐的体验，没有人物在历史河流中的潜伏与腾越，历史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和永恒的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历史人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英雄和思想巨擘。选择晚清历史人物作为课题，是因为晚清处于大变局时代，晚清人物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徘徊与追求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也影响着时代。他们在迷惘与困顿中彷徨，在与时代斗争的同时，也在尽力超越自己。整个转型过程既显示出他们刚毅的品性、执着的勇气、恒定的信念，又表现出他们的保守、迂腐和狭隘。当时世界发展进程对中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它要求中国以闪电般的速度改变自己，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抛开经济、文化的进化层面，仅就政治体制而言，晚清 70 年就经历了三次尝试和变革，纵观英、法、德、俄、日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政治改革速度史无前例。

基于通识教育的博通与精深相融合的双向要求，以及教学的学术性与普世性的双重标准，本课程的构思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处理好大学课堂的人物教学与影视传媒教育的差别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各类讲坛应运而生，其以浅显、风趣的讲述风格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对中国的文科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传媒发达，影视和小说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但是荧屏历史、小说历史与历史课堂的区别在于它们之间追求的最终价值不同。小说历史、荧屏历史追求的最高价值是艺术价值，因为有艺术价值才会有市场。历史被艺术化的前提是重新浓缩和艺术构建，演绎出来即戏说的部分。而课堂教学追求的是人的教育价值，它不追寻市场，不在市场中寻租。可见，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有本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会随着大众文化层次的提高而逐渐变小。

但是戏说历史是有历史条件约束的，历史剧被赋予意识形态之后，戏说就不太自由了。如文字狱之下绝对没人戏说历史，尤其宫廷戏，更不能随便想象。封建时代的传统戏剧一般都是颂扬忠臣，反对奸恶，提倡忠孝。如历史剧中的白脸奸臣曹操，篡国谋权绝对该死。近代知识界由于肩负“开民智”的重任，非常提倡历史小说的教育功能。黄遵宪的“小说革命”带动了民国小说的发展。戏说历史小说最有成就的就是蔡东藩的 11 部经典历史小说，再加一部《慈禧演义》，从秦汉到民国的 2116 年历史，70 万字。他的戏说一定是与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很久以来历史剧就是为政治和现实需要服务的。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抗日战争需要，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作品，批判国民党独裁和对日妥协。50 年代，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反苏，出现了《蔡文姬》、《胆剑篇》等作

品。历史剧《王昭君》是为了体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意在歌颂共产党干部的廉政为民精神，结果被认定是为彭德怀翻案，因而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有许多的历史人因为改编历史剧被打击、被批斗，从此文人远离历史剧。新时期的戏说历史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郑少秋的《戏说乾隆》风开始刮遍大江南北，到后来的《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①等作品纷纷出场，《汉武帝》、《大明宫词》等也十分火爆。戏说历史是市民文化兴起的一种现象，也证明了文化的丰富和人民思想的自由。

但是晚清、民国史很少被戏说。因为这是千年剧变的时代，是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代，造就了晚清人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往往集多重矛盾于一身，无法用一个词汇定格，所以争议很多，很难把握戏说的分寸，许多问题和观点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对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的考证。本课程引进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和学术趋势，以弥补在传媒时代下历史文化大众化造成的学术认识不足，并让学生学会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看待现代我们的改革超前与滞后的弊病，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局变动。

2. 突出课程人物群体的阶层特色在转型时期的表现

“阶层”在社会学研究中被用来指代社会结构划分中完全固定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分享类似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基于金钱、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政治权力以及威望等社会资源的人的不平等的地位划分，反映的是人们在财富、地位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差别。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我们不可能根据单一标准来划分社会结构。在讨论社会结构的划分标准时，大多数学者把经济标准作为主要标准，帕金划分英国社会结构时就十分强调财富的作用。但实际上，财富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良好的教育也是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教育资格是一种特权，它等同于拥有房屋、股份之类的有形财产。”阶级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是各种关系构成的一个系统。韦伯提出了由“阶级、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等更多因素也应当被考虑进来。社会等级表现为一种地位体系，它取决于相互影响的几个可变因素：出身、称号、财富、职业、生活方式和对权位的占有。

人们大多承认社会结构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血缘联系、婚姻、采取的生活方式、拥有的经济资源、职业、文化兴趣、活动范围以及心理感受等多种因素来划分社会结构。这样认识的结果，可能导致我们将社会阶层的划分看作一种主观上的归类，即社会阶层是以各阶层成员的主观认同为基础划分出来的。

本课程所选人物不是按照统计方法的数据模型分类，而是采取主观认同的分类法。基本考虑财富、文化和名誉等综合因素，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阶层的分类习惯，并结合人物在近代的影响力，将晚清人物分为宫廷人物、儒士、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商人、农民、秘密组织人物等进行评介。本课程重点不在于解决近代社会的阶层划分问

^① 雷颐：《“历史”的荧屏书写》，《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期，第122页。

题，而在于分析阶层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为观察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提供思考与借鉴。

大多数晚清人物在近代与传统中寻求救国之路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本课程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及阶层人物群的评介，来反映变局时代同一阶层的共性与互动和不同阶层间的互动与矛盾，反映出变革时代阶层人物的特征和不同阶层的人物对时代的意义，由此，深入展现晚清转型史。同时，要求我们以学者的修养和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体味时代与命运，在他们的行动和思辨中感悟历史。

3. 突出近代人物在修身与人生实践方面的特色

晚清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时期，又面临着民族危机时期和文化转型时期的双重困境。近代中国人在保持传统文化价值和利用西方文化救国之间的困顿与选择的心理历程给了现代社会如何保持传统文化以无限启示。此外，当今大学的教育重点在于知识教育，突出问题是修身教育不足，造成学生的精神缺失。本课程通过对变局时代晚清人物个人修养和人生实践的精彩回顾，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人格精神，给学生以价值选择和人生实践的答案。

总之，本课程主要是加强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在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之间进行适当的人生定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短期的课堂讲解相对于整个晚清史或许是挂一漏万，不周之处，敬请见谅。

编者

2012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领导者——宫廷人物	(1)
第一节 关于晚清的几点认识	(1)
第二节 奕訢	(4)
第三节 慈禧	(11)
第二章 儒士——曾国藩、李鸿章及其幕府	(21)
第一节 曾国藩及其幕府	(21)
第二节 李鸿章及其幕府	(38)
第三章 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	(57)
第一节 康有为	(57)
第二节 梁启超	(68)
第三节 康、梁之间	(80)
第四章 政治人物——孙中山及革命党人	(85)
第一节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85)
第二节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95)
第三节 孙中山的两个愿望	(99)
第五章 在商言商——晚清商人	(106)
第一节 晚清商人的类型及特征	(106)
第二节 商法的诞生	(113)
第三节 晚清商人组织	(118)
第四节 商人与商人组织的其他活动	(121)
第六章 洪秀全及农民运动	(126)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	(126)

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人物评介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	(132)
第七章 大时代，小人物——秘密组织	(139)
第一节 秘密组织概况	(139)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	(141)
第三节 晚清的神秘主义与秘密组织	(143)
参考文献	(151)
后 记	(154)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领导者——宫廷人物

晚清遭受外敌入侵之后，以天国自居的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制度与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挑战。鸦片战争期间，士大夫的言行和争论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科技、政治的态度。回想 18 世纪的王朝历史，西方的入侵早已风雨满楼，只是王公贵族、士大夫们的虚骄麻痹了自己。随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国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以自身阶层认识作出了各自的反应，但总是摆脱不了自身的时代和阶级局限；而在今人看来，正是他们本能的、迂腐的、落后的反应在不觉中改变着落后的中国，他们在先进的技术和经济领域的探求推动了中国的体制、思想慢慢进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也逐渐脱去封建社会给他们的嫁衣，在政治领域开始切割清朝腐朽的肌肉。维新派在切割中反思和退却，革命派在激进中不自然地妥协。要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作深入的认识，不然就会出现误解和偏差。

第一节 关于晚清的几点认识

一、晚清的落后与皇帝的素质

中国的宗族关系反映在王权上是嫡长子继承制，但嫡长子继承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憾。

首先，嫡长子继承制不可能使最优者继位。明朝皇权跌宕起伏，在于明代皇帝贪财好色、荒淫无度，炼丹、嗑药比比皆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就是一例，他继位才 29 天，就因为服用“红丸”来刺激性欲而暴毙。

其次，有时候也会违背皇帝的意愿。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想立贵妃生的福王为太子，但福王非嫡也非长，遭到群臣反对。万历皇帝为此与大臣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致使其 30 年不上朝，最终立明光宗为帝。嫡长子继承制在实践中不能避免皇权危机。明朝经常出现皇帝奢侈、搞法术、几十年不上朝、宦官专权、亲情间互相残杀、夺权等。

最严重的是引起动乱和战争。朱元璋将帝位传给喜爱的嫡长孙引起了“靖难之役”。1399 年，燕王朱棣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并公布《靖难檄》，称“皇考太祖高皇帝未省何疾，不令诸子知之，至于升遐，又不令诸子奔丧，欲屠灭亲王，以危社稷，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不得不起兵御难，誓执奸雄，以报我皇考之

仇”。朱棣起兵的理由是朱元璋的丧事没有严格按照礼仪进行，建文帝屠戮兄弟宗亲，所以要报仇。观察明代皇位继承的危机，不管用何种方式都是危机，而其中最常用的是“礼制”，这套礼制既规定着权力继承的方式，也束缚了可能的继承人变动，把明帝国推向了危险的处境。可见，没有可行的制度，最高权力的继承将是何等的危险。

清朝的皇帝改变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不科学性，变为密封立储。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人承大统的可能，避免了相互的猜测和厮杀，一定程度上比嫡长子继承制有了择优的可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使所有的皇子 and 重要王宫的孩子都要一起接受天子的教育，即接受“以天下为重”的理念教育，任何人今后当皇帝都要有“天下”的理念和责任。这样专业的皇帝培养机制，是明朝不能比的。即使权力危机引发政变，上台的还是具有基本素养的皇帝。此外，清王朝坚决以礼法治家，清朝很少出现明朝那样的皇权互相篡夺和残杀，降低了皇权动荡的损失，使政权维持了几百年，至清朝灭亡时，清王室内部仍然秩序稳定。阎崇年的《清十二帝评说》中明确指出清朝没有坏皇帝，尽管最后还是避免没落的命运。

近代以来清朝皇帝最大的弱点是不愿正视外面的世界。中国革命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除了中西间的法律文化不同和革命党人的温和革命理念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朝没有让人发指的暴君和昏君。但是清后期的皇帝能力很明显弱于时代要求。道光皇帝临终遗恨：“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结果“遗留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之大乱，外有鸦片战争之奇辱”。对于鸦片战争，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认为不过是历来边疆的一次挑衅而已。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深掘英国的档案，从英国国内的战争舆论与中国船只、炮舰、人员部署等角度深入考证，论证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究竟是因为实力差还是人的失误，认为这与林则徐、耆善等人的虚假奏折和错误的判断有关。但是道光皇帝却恰恰没有当年康熙亲征、乾隆下江南的魄力，最终造成整个王朝的悲哀。

二、经济问题是晚清面临的重大难题

一个王朝衰亡往往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关于封建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王亚楠《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各有所长，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政权变革和封建土地的经济问题。明代后期，皇帝就开始滥用权力搜刮，钱不够花，要靠发放牒片度日，这样的政府垮台指日可待。宫廷内部的情商和权力斗争的结果只是皇位的更替和几个大臣的死亡，不会太大地影响百姓生活，一个王朝最终灭亡还是由于经济失衡，造成百姓揭竿而起。再高的情商和谋略也解决不了封建王朝的经济问题。

广州鸦片走私 40 年，白银外流，通货膨胀。当时中国是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老大，白银相当于今天美元的地位。19 世纪中期 1 两白银相当于 1.5 ~ 1.6 美元，1 英镑等于 5 美元或 25 法郎。由于鸦片走私，使清政府库银很快从 7 000 万两降到 1 000 万两。现在叫黄金储备，当时是银本位储备下降。道光元年（1821）一两白银值 1 000 文，到 1836 年变为 1 300 文，到 1838 年变为 1 600 文。中国政府反对鸦片走私，却不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无济于事。

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考证

首先，清政府宫廷内的花销有严格的规定：各个级别的补贴额度都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如乾隆钱不够花，要委托南方的商人帮他放贷；咸丰需要穿补丁裤子过日子；慈禧大手笔花钱，但受到奕訢严格限制，造成双方的积怨。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还是银子，都有一种“耗羨”陋规，所谓“耗羨”即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羨”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雍正年间，为了革除这种弊病，就把耗羨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每年给“养廉银”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洁，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敲诈勒索，由于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比如，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银子；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他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诈的好机会。“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俗语足以说明当时司法腐败的严重。

县级官员的收入，以中山大学邱捷先生从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广东省城城郭包括南海、番禺，必须保证城中各官司衙署的需要。日记透露，省城办差，南海承担六成、番禺四成。同治十一年，杜凤治为上司衙署的支出是：督署 11 114 两，抚署 3 445 两，臬署 1 355 两，藩署 823 两，粮署 265 两，府署 460 两，学署 825 两，将军署 113 两。这只是“正常”的支出。如果有新的上司到任，支出就大得多。同治十年，刘长佑来粤任巡抚，需要重修衙署，购署中物件用了 4 400 两，两县要垫赔 1 400 两。两个月后刘调任，杜凤治为新巡抚张兆栋筹备署中家具、用品，又花费了 3 000 两（旧官离任通常会带走署中能带的一切物品）。对乡试以及省城官场的宴会、演戏、会议，上司的出巡视察，官员的送往迎来，两县都要垫赔费用。如同治十一年春节后的公宴，两

县就垫赔了340两；同年庆祝慈禧太后万寿演戏三日，两县垫赔上千两。此外，还有很多自掏腰包的公务支出，如“羈所三处押犯五六百名，逐日口粮由县给付，无款可筹，均系捐廉发给”。至于私人的馈送数额更为巨大，同治十一年总督瑞麟生日，杜凤治所送寿礼连门包费，共计3000两。巡抚少爷娶亲、总督添孙等均须送礼。其日记记载：“送礼以玉如意为先，其余还有金玉物件、绸匹，最是门包不易举动，动凡送礼一次，不论收否，门包先已由巡捕收下，一处一总在内约四百金，两处约计千金略少。”总督的亲属、幕客、巡捕、门房、厨子等，杜凤治都要打点到。总督购物往往发单要两县送银，杜凤治也无法判断是否真是总督的命令。每月总有几次不等，督署内还有人两面开账。省里还要给各衙以补贴，晚清官员工资不高，一些没有缺差的穷官日子更是难过。督抚在年节前会命令南海、番禺两知县发放给穷官“周恤银”，如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底，发给贫穷的候补道台（50两）、通州县（每人二三十两不等）、佐杂（每人十余两）“周恤银”，“不贫而冒领者颇多”；此外，又发给故员亲属银两。

杜凤治在粤任官十几年后，除清还债务、支付各种支出、维持多个家庭的生活、在家乡购买240多亩田产、为子侄捐官等之外，尚余现银3万两。广东南海县在全国算是富裕的县，而且杜凤治自身很善于经营官场，其他地方的官员收入很难高于南海县。可见，能达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收入的地方并不多。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要把握几点：①多少因素是客观历史环境造成的；②多少因素是主观失误造成的；③他们的选择是不是符合历史的要求；④与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的突出特点或者超越之处。

本章重点讲述对晚清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宫廷人物：一个是清王朝内最先对西方有感触的亲王奕訢，另一个是影响晚清40年的慈禧。

第二节 奕訢

人物简介：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中称他“绸缪宫廷，定乱绥疆，罢不生怙，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

一、皇权的错失

1. 皇帝的选贤与选能

《清稗类钞》的记录和清朝野史等记载中有关这段历史的四种传说表明了人们对奕訢错失皇位的惋叹和给予奕訢的厚望，希望奕訢带领清王朝迈向富强。

(1) 传统社会的选优与师生关系

传统社会选拔皇子首先是对老师的考验，从两位老师的教导可以看出考皇子其实是考老师，但不是考能力，是考察先皇的心，并且皇帝的命运与老师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从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命运就可以看出，皇子的命运对老师多么重要。翁同龢回首一生，“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谈”。

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教导他打猎时不要与兄弟争雄，当父亲问起缘由时就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道光赞叹“此真帝者之言”，而奕訢则满载猎物而归。奕訢的老师卓秉恬告诉他当父皇问起政务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咸丰则谨守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道光皇帝在“选贤还是选才”中犹豫不决，最终奕訢获得“恭亲王”的遗诏，咸丰获得“称帝”的遗诏。道光两份遗诏的用意是保护和安慰奕訢，告诫奕訢恭慎行事。道光对强者和弱者都要给予保护，免得与皇权碰撞出火花，而其最大的错误是在千年转型的时代，没有以“能”作为选择继承人的标准。

此事件传达出两个信息：传统社会的选优标准和师生关系。中国传统社会选优的标准是“贤”而不是“能”。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思想适合封建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皇权的统治。封建经济相对平稳，“贤”是保持江山社稷的最佳途径。汉武帝因为“有为”与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冲突极大，雍正皇帝因为“有为”增加库银5 000万两，被视为暴君。有为的皇帝一般都被称为扰民的君主，因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小政府模式不需要统治者多有才能。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就是好的政府。但小政府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捉襟见肘。时代需要政治家有胆略、风范，坚忍不拔，具备治国之才。道光帝依然选择贤者，很明显没有看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

其次，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如此密切和信任。学生能够听从老师的教诲，并且老师与学生的命运紧紧相连。传统的师生关系特点是尊师重道，尊师爱生。《礼记·学记》有云：“凡学为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传统学校中，强调“师”与“道”的统一，“师者，人之模范也”（《扬子法言》卷一）。因为“儒”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体道之人，儒即师，师即儒；师即范，范即师。师、范、儒都指向知识和德行的统一。传统的经师、人师合一的“士”与学生精神和知识的联系，保障了尊师重道的师生关系。

(2) 平庸的皇帝与优秀的臣子

位置与能力的错位注定了奕訢一生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因为其优秀所以被统治者利用，又因为其优秀而被视为权力的威胁，对于奕訢个人来讲，是人生悲剧的开始。“妒贤嫉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国儒家文化的“尚其贤”源于《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原文：“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中国人在弱与强、贤与能之间的价值选择充满玄机。

2. 恭亲王奕訢的恭与谦

1850年3月咸丰皇帝继位，一直没有给奕訢下诏正式册封。两年内奕訢韬光养晦，

藏材示拙，以示顺从。他在《赓献集》里对咸丰皇帝暗示顺从的愿望：“宵旰勤政期无遗，竟业亲贤永弗忘，……自揣疏庸惭莫报，常聆训示慎毋忘。”咸丰皇帝看到他恭顺有加，于1852年2月册封奕訢为恭亲王，但是不给重位，命他担任负责祭祀、扫墓之类礼仪的职位两年。18岁的奕訢在代皇帝祭祀陵墓的扫墓路上题诗一首表达心迹：“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当年曾扈跸，今日泪两行。”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政权对峙，北伐军逼近京津，4月咸丰决定化金钟三口接济军费，恭亲王勤谨奉公，皇帝很是欣赏。9月，咸丰命其为署理侍卫内大臣，负责巡防，10月破例让奕訢入军机行走，第二年2月又指定奕訢为领班军机大臣。奕訢踌躇满志，荣耀至极。不太拘于小节的奕訢，忘了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渐渐露出性格中的锋芒。1855年7月因母亲孝静皇太妃埋葬的问题，在母亲入葬后第二天奕訢被罢免，回上书房读书。7月11日皇帝发布上谕：减太后丧仪12日，太后不升太庙。21日奕訢因办理丧事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被解除全职，丧事由翁心存办理。10月25日埋葬之后，咸丰27日发谕旨：“朕祇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知奕訢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是皇考遗命，不足以传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以昭信史。”此时，奕訢心灰意冷地赋诗一首：“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忠荃遗骚雅，高风问楚滨；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

二、辛酉政变

1. 奕訢的能力与威望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奕訢不主张咸丰去热河，上奏咸丰帝曰“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已”。25岁的奕訢提出对策：①训练天津乡勇；②增强僧格林沁所部军力；③命令广东乡兵攻击香港。这“围魏救赵”的策略虽不算优秀，但表现了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已经胜于逃跑的皇帝。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巴夏礼蛮横嚣张，要求带兵进京给皇帝递国书，并要清军撤出张家湾，载垣命僧格林沁逮捕了巴夏礼，导致谈判破裂。中国“团勇不过万人，只可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硬着头皮与英法联军决战于八里桥，结果战败，皇帝逃跑，沿途乡村仍愤然不平，不甘心接济夷人。奕訢判断即使交出巴夏礼，英法也未必撤军。果然，额尔金拒绝和谈，烧毁了圆明园。奕訢见事已如此，奏请皇帝“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未准。奕訢面对满目疮痍的京城，再次向咸丰帝奏道：“臣奕訢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复何所顾惜。……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皇帝回复曰：“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金息侯在《四朝佚闻》中谈起咸丰帝：“帝临终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帝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从两者鲜明的对比可知奕訢的责任意识和对国家大事的认知水平。

奕訢留守北京，受命于危难之际，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自己的一群骨干力量，被称为“恭党”，成为辛酉政变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与帝国列强的交往中，奕訢得到西方国

家的支持，为辛酉政变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外部环境，同时也为日后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机会。奕訢的对外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奕訢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说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这是奕訢坚持对外“羁縻”政策的认识基础。

2. 政变中的奕訢

辛酉政变中，共同的目标决定了双方联合的必要性与结果。奕訢作为皇弟要为清王室生存负责，与慈禧合作的共同目标是权力不能落在八大臣手里。按照咸丰皇帝的安排，子幼母壮，八大臣辅佐国政，母亲不是皇后，又要保护皇后慈安，所以留“御赏”、“同道堂”两个印，但八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遗诏保护不了皇子和慈禧的安全。事情一开始就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奕訢两次临危受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与京城中的军队首领僧格林沁、胜宝等联系紧密。慈禧的聪明和心计表露出来，要先回京，分散八大臣力量。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恃宠而骄，飞扬跋扈，连兴大狱，排除异己，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分裂。肃顺犯了愚蠢的错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而放弃了军队。

皇室政治权力的标志也是政变所必备的军队、玉玺、人心，斗争从一开始就很有优势。政变是军事部署、政治势力的争夺与分割以及权柄（玉玺）的归属。奕訢必须有慈禧才能参与政变，慈禧必定走上历史舞台。军队是政变和革命的重要基础。如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与袁世凯没有谈到军队的归属，造成日后隐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停止内战也因为军队的问题导致谈判破裂。

政变7天后慈禧与奕訢界定权力，注定了奕訢一生沉浮的命运。这一时期，慈安和慈禧处在同一战线，慈禧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她们母子和慈安在皇宫不受任意的侵犯，保全性命，因为奕訢也可能是夺权者。慈禧有玉玺，和同慈安发布诏书很容易，慈禧连发五个上谕：

十月初二日，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谨会议两宫垂帘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

十月初七日，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按照太后裁定意旨再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再呈请两宫太后审定正式颁发。

十月初九日，内阁又奉上谕称：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

十月初十日，又发布上谕，奉两宫懿旨，对康慈皇太后崩后一直未升太庙一事，着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尊谥，后“升祔太庙，永极尊崇”。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钦天监选定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仪式在养心殿隆重举行。

奕訢手握议政王、军机处、宗人府大权，掌控朝廷内外，大有“垂帘其名，实权归己”之势。但 28 岁的慈禧有很强的宫廷生存能力，慈禧与奕訢的权力界定中，慈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奕訢注定不能登到历史的前台。慈禧的垂帘听政固然缺乏祖制，然而皇帝冲龄阶段的“辅政”体制在清朝以往的历史上也无一善终——从多尔袞摄政，到鳌拜等四人“辅政”，直至眼前的八大臣“赞襄政务”，正所谓“殷鉴不远”。

3. 政变后的奕訢

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之后奕訢遭到严谴，慈禧利用小小的起居注官蔡寿祺弹劾奕訢，家务事朝上议，谁敢乱说话，慈禧亲拟奏折削去奕訢议政王、首席军机等职务。慈禧和奕訢的矛盾显露。这一时期，慈安与奕訢和同治的关系都很亲密。慈安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慈安是他们之间矛盾关系的平衡器。慈安死后，平衡器消失，1884 年甲申之战，中法战争大败，借此机会，奕訢遭罢黜，“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惩”，奕訢培养起来的洋务派被赶出军机处。

之后十年，奕訢在家赋闲，慈禧继续孤立奕訢。奕訢十年丧失四妻、三个子女，亲王爵位没有人继承。甲午战争之后再次被起用变得保守，反对变法，希望皇帝尊重慈禧，改善关系，“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保泰持盈，首重尊养慈闱，以隆圣治，况值强邻环伺，诸切隐忧，尤宜经武整军，力图自强之策，至于用人之策，伏望恪遵成宪，维系人心，与二三大臣，维怀永图”。并劝告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信小人言”。

三、奕訢的历史贡献

1. 突破传统，学洋务

1861 年奕訢设立京师同文馆，计划从八旗中选拔子弟。威妥玛被聘为老师，但规定他只许教文字，不许传教。1862 年只招到 10 名学生。同文馆因没有与科举考试成为一个体系，不方便招收学生。奕訢想先让贵族弟子学外语、出国，但遭到了贵族的抵抗。京城中充满强烈的反对之声，有人散发传单，“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奕訢获得“鬼子六”的外号。1902 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奕訢的带动下，出现了李鸿章建立的上海方言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校等中国第一批洋务学堂。在李鸿章办的上海方言馆，“方言”意思是不把它们当国家语言，以减少认识分歧。关于派遣留学生，1863 年奕訢等有意像日本那样派人赴美、俄等国学习技艺。奕訢说：“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筹选。”后来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1872 年中国实现了派遣留学生的梦想。

2. 镇压太平天国，稳固皇权

重用汉人是清入关以来祖宗忌讳的政策，1862 年慈禧发布上谕任命了左宗棠、李鸿章、郑元善、沈葆楨、骆秉璋、江忠义等 11 位督抚和几个布政使，当时全国是 9 府 18 省，全朝哗然。半壁江山掌握在曾国藩等汉人手里太危险了，恐重蹈吴三桂覆辙。

为保险起见，清政府建立江南、江北大营，防止湘军哗变。曾国藩自己都觉得“权位太重，惟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渐成外重内轻之势”。政府很快又发一文擢升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管理兵部，并特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给予慰勉，称“如此委重权于曾国藩，实乃其至诚真挚无私为国效力之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攻剿，以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不许再作推辞”。

3. 洋务外交

关于外交，奕訢认为“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律”。镇压太平天国后，1867年，奕訢提出《预筹备修约事宜》。奕訢希望“天下随时筹划，以冀一日自强”。

(1) 听从赫德的建议，派人出洋考察

奕訢听从好朋友赫德的建议，派人出国考察。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了赫德的动机：“中国应当从离群索居中出头露面，并且取得在国际大家庭的地位，……并且应当通过他自己的代理机构，去了解各西方政府的目的和实行他们愿望的力量。”老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出去，因为在以前出去就是逆民，永不能登岸。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在1866年由63岁的斌春带领，成果有《乘槎笔记》和《诗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认识西方的记载。上海滩赫德的碑文上写道：“中国政府忠实的顾问，中国人民真实的朋友，谦和、容忍、明智、果断，克服艰巨的障碍，并且完成了一项伟大的造福于中国和世界的工作。”如果晚清王朝当时能够突破自己的意识，先出去看看，将比后来海外留学生反对自己要好很多。到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考察时，已经无法收拾残局。

(2) 《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外交”的背景是1862年美国为了赢得侵略中国道义上的主动权，提出了“合作政策”。1862年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来到中国，声称：“任何土地的让与就是缩小了美国条约的利益”；“我们在中国，正企图用公平的外交关系代替武力，我们希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奕訢派遣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的理由是：“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蒲安臣的态度是“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訢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我们愿意派你出任我们的使节。”最后，因为中俄谈判问题，蒲安臣致疾，在俄国咯血而死，清政府进行了抚恤。

1868年7月，蒲安臣自作主张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国民都有游历贸易的自由，并要互相给予保护。《蒲安臣条约》签署后，他兴奋地说：“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1869年，根据条约美国获得大量的契约华工。《蒲安臣条约》在当时遭到士大夫的谴责，但在后来的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下，罗斯福总统被迫召开议会修改排华法案。2011年10月美国通过的对一百年排华法案道歉议案，也是根据此条约。